

【探讨与评论】

# 从“事件中的动员”到“空间中的动员”

——评麦克亚当和布代著《地域视野下的社会运动：  
解释美国居民在2000-2005年间对能源项目的抵制》

马 原

**内容提要：**《地域视野下的社会运动》反思了当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运动概念的刻板认识，指出社会运动的核心特征不在于冲突或暴力等外部表现形态而在于诉求的表达，并在社会运动动员机制的分析中引入了被以往多数研究所忽略的“地域空间”变量，将动员过程嵌入到地域空间的语境之下。该书所展开的实证研究超越了传统的“邻避主义”叙事，在治理层面考察社会运动的政策效应，通过实证研究来实现与社会运动主流理论传统的对话，并提出以政策倡导视角分析抵制动员的解释路径，为我国社会冲突治理和西方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框架和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运动；邻避运动；抗议政治；社会治理；政策参与

来自社会的不满与诉求如何被表达既是一种值得深入分析的社会现象，也是国家在社会稳定与治理层面密切关注的政策议题。因此，对于“集体行为—社会运动”<sup>①</sup>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学其他领域的研究类似，西方理论界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也是一个从现实经验中寻求普遍规律的过程，其发展和变迁轨迹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和时代风向。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集体抗议被贴上冲动、失控和应激的标签，成为反常和“非理性”行动的代名词(Smelser, 1961)。60年代中期开始，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 and 环境保护领域的组织化抗议行动大量出现，呈现出动员高效、诉求明晰的特点，这一时期研究者出现的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理论与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理论使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从集体行为论到集体行动论”的主流范式转变(冯仕政, 2013)，这一时期的开创性工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调。

大众抗议(popular contention)是一个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口趋势而不断演化的“移动的目标”(moving target)(Tilly, 1978)，社会运动的轨迹与发生形态必然会跟随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然

**作者简介：**马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冲突治理、抗议政治。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基层信访治理研究”(63172057)；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的基层实践研究”(ZX20170080)。

① 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于1921年提出，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的“集体行动”是与“个体行为”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个体在某种具有共通性和集体性的冲动影响下做出的行为”(Park & Burgess, 1921)。

而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却并未出现实质意义的变化,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是,这些理论是否能充分解释当下社会运动的现实特征?为回答这一问题,社会运动学者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希拉里·布代(Hilary Boudet)在《地域视野下的社会运动:解释美国居民在2000-2005年间对能源项目的抵制》一书(以下简称《地域视野》)中,以分析性叙述(analytic narrative)、田野调查以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的方法,结合了传统个案研究和推论统计的优势考察美国不同地区液化天然气(Liquid Natural Gas)能源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抵制行动。

《地域视野》作者在剑桥科学文摘(CSA Illumina)中的“环境影响报告摘要”数据库中的所有液化天然气、核能源、水电站和风电场等新能源建设项目,并在2004-2007年间完成最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49个项目计划中随机抽取20个样本。<sup>①</sup>该书的理论创新和贡献首先在于反思了当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对于社会运动概念的刻板认识,指出社会运动的核心特征不在于冲突或暴力等外部表现形态而在于诉求的表达,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研究框架。其次,该书在社会运动动员机制的分析中,引入了被以往多数研究所忽略的“地域空间”的变量,将动员过程嵌入到具体的“地方”(local)语境之下。该书作者所展开的实证研究超越了传统的“邻避主义”叙事,而是在治理的层面考察社会运动的政策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来实现与社会运动主流理论传统的对话。

具体到我国冲突治理的研究语境下,《地域视野》一书同样富有比较和借鉴的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基层冲突的现状与西方社会抗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话语隔阂。首先,我国社会冲突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孤立和分散,这种“细胞化”(cellularization)(Lee, 2007)的行动方式看似难以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所描绘的大规模全国运动的图景之中。其次,我国群众的维权行动的“剧目”(repertoire)缺乏典型社会运动的激进斗争色彩,一部分社会矛盾甚至被信访等科层体系所吸纳,导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独特的现象很难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找到解释。然而正如《地域视野》一书通过实证分析对“社会运动社会”给出了全新的描述,并揭示出发生在当代美国的抵制动员同样是“融入常规”和“嵌入地方”的:它们并不是以运动风暴的方式席卷整个社会,而是以更为温和的方式渗透在政治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为关键的是,该研究揭示出社会运动“抗争性”(contentious)的本质在于利益的碰撞,而不在于行为的冲突,由此提出以政策倡导视角分析抵制动员的解释路径,为我国社会冲突治理和西方社会抗争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框架和有益的启示。

## 一、“破坏者”还是“倡导者”? 反思社会运动的本质特征

社会抗争的研究者如同军事分析家,通常专注于最新近发生的战役(事件),并试图从有限经验中寻求普遍理论(Meyer, 2004),就这一角度而言,大多数社会运动理论都是特定时代氛围的产物。社会运动的概念正式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产生之初就承载了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独特时代印记,发展至今,已经吸引了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环境科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者的加入。在知识体系逐渐丰富的同时,却一直未能彻底超越60-70年代新左派/新社会运动时期形成的经典“运

<sup>①</sup> 最终环境影响评价的完成意味着针对建设项目已经不存在显著的动员风险,作者将抽样框确定为2004-2007年间完成最终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新能源项目,主要的考虑是为了获得完整、成熟的样本;而这些项目最初提案的时间和相关动员较为活跃的时间是从2001年至2005年。

动观”的影响。在这一理论传统影响下,社会运动被理解为边缘群体的破坏性、大规模抗议行动的同义词,戏剧化的冲突被认为是社会运动最典型的发生形态,被看作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核心推动力。

根据目前的主流理论,典型的社会运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类行为:“(1)在公共场合破坏性的抗议行动;(2)基于都市或校园的抗议行为;(3)由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提出的抗议性主张;以及(4)就某一议题与全国范围内行动的松散联系”(McAdam, etc., 2005)。上述类型较为贴切地描绘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标志性抗议事件,例如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学生运动等,因此可以总结出,典型的社会运动是“为促进或阻碍某种社会结构变革而进行的持续的松散组织化行动,是一种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McAdam, 1999)。其中“非制度性”被看作是社会运动区别于公共利益游说、竞选活动、公共教育改革等其他类型集体政策倡导行动的核心特征。时至今日,已有研究者开始反思当前理论界对社会运动内涵的理解是否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经验观察所形成的固化思维之中,尤其是一些研究表明,当前西方社会运动的表现形态已经日益呈现出常规与“准制度化”的特征(Meyer & Tarrow, 1998),例如达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通过对德国与意大利两国在20世纪60-90年代警方应对抗议(the policing of protest)的比较分析发现,两国警察在三十年间应对抗议行动的专业化与常规化程度有所增强,暴力程度却有所减弱(Della Porta, 1995);与之相呼应,麦卡锡(John McCarthy)与合作者在美国警方应对抗议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常规化特征(McCarthy & Clark McPhail, 1998)。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在社会运动最为活跃的50-70年代,大规模的剧烈冲突也并不是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因一系列抵制、静坐、游行等活动而产生广泛影响,但综观整个运动全过程可以发现,行动者对联名请愿、新闻发布、教育宣传和筹款活动等抗议技巧的依赖程度超过了破坏性的抗议行动,这些行动在外在形态上更加“常规”(routine),较少显现出冲突和暴力等破坏性的特点。

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视野下,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社会运动“剧目”(repertoire)所呈现的新特征。在“前社会运动时代”,由于缺乏足够的表达空间,社会抗议的典型发生形态体现为集体暴力这种“弱势者的武器”,突出了非制度化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运动理论的正式出现回应了集体抗议行为日趋组织化与理性化的社会现实。作为一种制度外的诉求表达方式,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同时呈现出“非制度性”与“政治参与性”的双重特征。那么,在可供选择的诉求表达途径日益增多的当今社会,“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是否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为回答这一问题,《地域视野》一书的作者在美国2004-2007年间完成“最终环境影响报告”的49个新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计划中,随机抽取20个项目作为样本。作者同时发展出六项综合了“非制度性”与常规行动的、层次分明的测量指标,用于测量当前主流理论中的“典型”社会运动,即严格意义上的非制度化集体行动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普遍性。此外还特别回应了在抽样随机性方面可能引发的有关“最小化抵抗路径原则”(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Bullard, 2000)的质疑:即,这些社区之所以成为能源项目建设的选址,是否恰好因为他们存在更微弱的动员倾向?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指出,新能源项目选址对自然地理位置有较为特殊的要求,可能遇到的当地居民的抵制并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风险,很多情况下甚至不是主要的风险。例如液化天然气项目要求选址必须坐落于或靠近海滩,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深水管道或靠近已有的管道设施,因此相比较技术可行性因素而言,能源企业通常不会对周边公众对项目的态度给予过多考虑。通过在20个样本项目所在的社区中展开调查,该书作者发现,与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刻板印象不同,当前社会运动展现出的最显著特征不在于行为的冲突性与动员的广泛性,其利益表达更多地融入常规化、

制度化的途径,政策倡导的特征日益凸显。

## 二、从“抗议事件”到“风险社区”:寻找社会运动的隐藏个案

《地域视野》尝试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在于,暴露在作为样本的20个环境敏感能源项目“威胁”下的社区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例抵制动员(opposition mobilization)?在分析对象的选择方面,该书作者提出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对分析对象的选择经常与研究的因变量,例如动员水平、抗议规模等密切相关:对抗程度越高、动员规模越大的抗议事件,越能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报道,越有可能被研究者选择作为个案加以讨论,甚至成为分析社会运动领域教科书式的典型案例,然而这些“根据因变量选择的样本”(select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却可能因选择性观察而具有“非典型”(atypical)特征,难以刻画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因此,《地域视野》的作者没有像以往研究一样,将社会运动组织、社会运动的参加者等以“运动事件”为核心的要素作为分析单位,而是以存在能源项目建设风险的社区作为分析对象,一方面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样本选择上的路径依赖所导致的选择性观察。

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发展出六项指标测量了作为样本的20个新能源项目所在社区居民对于项目选址的反应,据此判断同时满足“非制度”性和“集体性”标准的、严格意义上的抵制动员(opposition mobilization)在现实中是否确实普遍存在,这六项指标包括:(1)发表有关能源项目选址的报刊评论(op-ed letters);(2)项目的支持或反对者出席项目选址环评报告听证会;(3)能源项目的支持者或反对者出现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听证会之外、涉及项目的公开场合,例如市政会议、主导项目公司举办的信息交流会;(4)项目反对者或支持者组织的公开会议;(5)反对者或支持者提出的诉讼;以及(6)反对者或支持者发起的抗议行动。很明显,在上述六项指标中,只有最后一项同时符合“非制度性”与“集体性”的特征。通过对样本所在社区动员情况的考察,作者发现严格意义上符合标准的抗议行动数量“微乎其微”(paltry),针对拟选址的能源项目,只出现了一例典型意义上的抵制抗议,对于众多暴露在环境风险之下的社区而言,非动员(non-mobilization)的状态反而是更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常见的反应。《地域视野》的作者认为,这一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以往对于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研究严重夸大了大规模抗议行动发生的频率、典型性以及在整个社会运动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性,赋予“社会运动社会”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这种刻板印象与现实的脱节甚至会更加严重,“导致对于运动的模式化印象,扭曲了人们对于大众抗争的理解”(Doug McAdam, et al., 2005)。

尽管大规模全国性运动并不常见,但不同利益、不同意见之间的博弈和对抗随时随处都在发生,例如在该书所涉及的能源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抵制方和支持方都经常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进行相对日常与制度化的意见表达,这些被作者称为“隐藏的个案”的行为不完全契合教科书式的“典型”社会运动的特征,但发生数量与频率却可能远远高于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对它们的分析和讨论有助于进一步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具体行为方式的常规化并不意味着“斗争性”的削弱,这种现象如果用“抗议悖论”的概念来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环境更为开放的结果:艾辛格(Peter Eisinger)在对美国城市种族抗争行为发生频率的分析中发现,对于潜在行动者而言,抗议行动最容易产生在以开放和封闭因素相混合为特征的体制中,高度开放的政治通道会将任何新议题迅速吸收到决策体制内,反而不易激发抗议(Eisinger, 1973)。与其类似,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研究也揭示了抗议频率与政治开放程度间并非直线对应(Eisinger,

1973):当国家允许社会成员以常规、持续的方式表达主张的情况下,后者通常更倾向以常规方式施加影响,集体抗议反而会增加行动成本。具体到《地域视野》所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估领域,地方居民的诉求可以通过前期的评估和论证程序进入决策过程,这种高度开放的制度设定使项目论证阶段的动员过程以常规化的方式隐藏在论证过程之中。

因此,在对社会运动的本质与内涵进行了反思与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地域视野》作者将该书所讨论的社会运动限定为一种“松散组织化的、为推动或抵制社会变革而进行的持续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超越了以往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过度关注“非制度性”抗议行动的视野局限。就这一角度而言,该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和意见的矛盾而不在于行为方面的冲突,通过挖掘社会运动领域的“隐藏的个案”,将对动员机制分析的视线扩展到“未动员”的状态,更清晰地展现从“隐性的抗争行为”到“显性的抗争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因素和经历的过程,从“推动或抵制社会变革”的政策倡导视角重新发掘社会运动的本质。

### 三、社会运动的地域要素:在空间的维度解释动员差异

《地域视野》一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共识在于,激烈冲突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有关不同利益与观点的常规的、制度化碰撞却时刻发生在政治社会生活之中。这一发现澄清了有关社会运动的刻板印象,扩展了对于抗议政治的研究视野。为探索社会运动发生的内部机制,作者以风险社区作为分析单位系统的比较“风险群体”的“动员尝试”(mobilization attempts),分析样本社区中对能源项目持抵制、支持或中立的各利益相关方如何展开动员和表达诉求,并尝试针对不同社区面对类似项目的反应进行比较研究。

#### (一)如何挖掘“隐藏个案”:研究方法的选择

从具体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分析“隐藏个案”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问题在于如何研究未发生的运动(non-event)。更确切地说,研究者如何发现或定义处于动员风险中的社区。《地域视野》借助美国联邦环境政策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案(NEPA)》,私人企业申请建设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经过公共审查(public review),在“联邦机构认为在建的项目可能显著影响环境”或“在环境方面受到争议”时,NEPA要求针对所有的公共或私人项目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向公众宣传。由于所有大型的、可能有争议的基础设施都要求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评估报告的完成使待建项目所在的社区处于动员的风险之中。环境政策为抵制运动提供了一个窗口和动员的契机。非政府团体和个人可以参与最少两次公开听证会,任何个人都可以在听证会上针对环境影响评价的草案和最终报告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在正式程序之外,相关企业可以对项目进行介绍,与社区通过一系列方式进行互动,包括联系报纸等新闻媒体、召开媒体发布会、组织信息介绍会、与地方官员或社区领袖进行非正式的会面以及联系可能支持或反对项目建设的组织。项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会建立独立组织,召开相关会议,收集和提交有关项目成本和收益的相关数据,联系媒体发表他们的意见以及组织示威活动。

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类似,社会运动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也面临大样本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的两难,但总体而言个案研究的方法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更为普遍,是这一领域“方法论箭筒中最核心的一支箭”。个案研究的局限体现在对总体的描述和解释能力不足,同时如前文所述,可能因资料获取能力的

局限而导致“根据因变量选择样本”。考虑到这些因素,《地域视野》的作者设计出一种介于两种模式之间的高效混合路线,即通过田野调查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究。这一创新也是该书作者是与社会运动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流的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方法论传统的理论对话。两位作者在为期7~10天的传统田野调查之前,对20个样本项目所在的社区开展了基线调查,针对每个社区进行两次在线数据收集工作,对社区的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city)等相关情况进行静态的、比较的描述,认为这些“先行条件”(before conditions)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居民对于选址项目的认知。在前期在线收集数据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报纸收集相关社区在宣布将要建设能源项目一年之前的信息,以及与项目有关的决策程序持续期间的信息。作者主要关注的重点在于:在项目宣布前夕,社区的主要问题或冲突是什么?这些议题或冲突是否涉及有争议的土地使用问题,可能有助于建立针对提议项目的解释框架?在项目宣布之前,当地主要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当地新闻媒体的立场是什么?在项目论证期间,需要收集的信息主要是有关项目论证的决策过程。

## (二)“情境”要素与地方化的动员过程

作者将基线调查过程中收集的相关信息归类为客观风险、政治机会和公民组织能力等“经典动员要素”(classic mobilization factors),以及对于论证设施或产业的熟悉程度、以往的抵制经历和经济困难程度等“情境要素”(context factors),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6个关键测量依据。在此基础上,关注的问题首先在于,哪些因素是促进或阻碍“抵制动员”产生的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论证设施的客观风险、政治集会和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力等被社会运动研究者普遍推崇的“传统变量”能够决定抵制动员程度和水平,然而即使缺少这些传统变量,经济困难程度、以往的用地规划以及对类似项目的抵制经历这些与社区本身相关的“情境变量”也能够促进社区对于有争议能源项目的抵制,这些情境变量对于抵制动员的发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作者将这些因素称为能够激发动员的“火花”。在分析这些可能导致动员的潜在因素后,作者对于选址成功与否等结果变量的因变量(predictors)的分析显示,是否存在抵制和政府间的冲突对于选址是否成功具有决定性影响:缺乏地方抵制的能源项目通常能够得到批准和最终建设成功,即使较低程度的反对行动并不总是能阻碍项目的批准,然而地方居民的抵制如果和政府决策者冲突等“外力”相结合,地方居民动员与政府决策者意见不同的结合会成为导致项目被否决的“最佳路径”。

在以往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对全国性运动的经验研究定义了主流研究的理论基础,对于“地方化”运动的研究相比之下较为罕见。然而这些所谓的全国性运动在本质上是地方运动的聚集,动员可能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发生,但是几乎从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除个别的全国性罢工之外,动员总是嵌入到地方社区的情境之下,被地方环境塑造的。以往理论对运动事件本身的关注高于对外部环境、特别是“地域”因素的关注,而相关理论研究对于全国性运动的过分关注加深了这种误解。在《地域视野》一书中,作者认为许多研究中涉及的“全国范围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甚至包括民权运动在内的一些公认的“全国性运动”也只是一系列地方抗议行动的松散聚集。在当今社会,尽管环保运动、性别少数群体(LGBT)运动和其他广泛的诉求表达行动在许多地区相继发生,但这些运动并没有超越地域因素的影响。相反,抗议行动的发生总是嵌入到地方语境下,因此该书作者提出,应当将研究更多聚焦于地方的具体情境,关注基于地域的共同阅历如何塑造运动的预期和结果。

《地域视野》一书的作者麦克亚当教授在以往研究中,曾经通过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分析诠释了能够影响社会运动的各种外部因素:非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只出现在外部环境足够开放,使动员成为可能的情形

下,政策上的有利转向与当时包括南部棉花经济崩溃、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城市移民,以及私刑处决数量的下降等政治环境都降低了非裔美国人组织动员的风险和成本,增加其作为选民的政治价值。与此同时,当时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的判决确认了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的不合宪性,<sup>①</sup>这一判决不仅使种族隔离的特定议题本身获得更多政治关注,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判决对种族融合的明确肯定也是激励其动员的“认知解放”;此外,民权法案的最终通过将公众注意力吸引到民权运动者关注的事项,民权运动所获得的精英联盟、特别是肯尼迪与约翰逊两届政府对于民权运动者的保护为组织与动员创造更安全的环境,而民权运动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在社会运动发生过程中,政治机会和组织力量的增强仅仅是社会运动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使一个社会运动从可能转化为现实,动员群体必须经历一个“认知解放”的过程,在该书所涉及的能源项目论证过程中,不同地域空间的情境要素,例如以往的抵制经历、对论证设施或产业的熟悉程度等,正是通过促进了当地居民的“认知解放”从而成为决定动员能否发生的关键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动员过程与地域环境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地域空间视角下的“机会螺旋”(opportunity spiral)(Gamson & Meyer, 1996):一方面,地方语境能够通过“情境变量”促进动员的产生;另一方面,成功的动员行动也作为抵制经历,成为地方情境的一部分。

在通过风险社区的基线研究解释了运动发生的“前因”的同时,作者还关注了动员的“后果”,即地方邻避行动在地域上的扩散。作者将抗议行动在地理上的扩张或收缩称为“规模转变”(scale shift):为什么对特定能源项目,例如对液态天然气接收站项目的抵制,在一些地区能够扩展为影响更广的地区运动,却在另一些地区并没有发生?作者讨论了面对地方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时的环境正义观和共同利益感,从“邻避”(不要在我的后院)到“不要在任何人的后院”(Not in Anyone's Backyard),到“不要在地球”(Not On Planet Earth, NOPE)的溢出过程,并提取出促进这种行动“规模升级”(scale shift)的关键要素:框架扩张/框架连接和动员体系之外的政府权威对运动的认可与合法化。

#### 四、从“托勒密视角”到“哥白尼视角”:地域网络中的社会运动

借助上述实证研究,《地域视野》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运动是什么”。作者在本书开篇回顾了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发现在知识体系日益完备的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议题却高度聚焦,形成了特征鲜明的“运动中心”(movement-centric)方法论传统。两位作者将这种方法论传统类比为托勒密(Ptolemy)的“地球中心”宇宙观:社会运动研究者普遍以“运动事件”为核心展开对动员机制的分析,正如托勒密宇宙观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运动中心理论传统的形成来源于对早期社会运动的经验观察,在经济社会经历发展和巨变的当今,不断面临解释能力的局限和经验现实的挑战。

首先,运动中心框架下,进入研究者视线中的个案可能具有“非典型”(atypical)性,难以刻画总体的特征。如果依靠分析运动事件来探索动员机制,进入研究者视野的运动“事件”必然是动员获得成功效果的个案,这些“根据因变量选择的样本”(select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对样本的选择性观察将大量存在动员倾向、却由于各种因素而未能成功实现动员的“隐藏的抗议事件”被排除在观察和统计范围之外。与存在动员风险的全部个案数量比较而言,能够最终出现在研究者视线的社会运动数量有可能只是冰山一

① 具体可见: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Board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

角。就这一意义而言,以运动事件为中心的研究将动员机制预设为一个排除了偶然因素干扰的确定过程,导致理论研究对客观现状做出错误的估计,模糊了导致它们出现的因果机制,夸大了社会运动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对于长期社会变迁的重要性。因此作者提出,以往的研究传统导致目前的研究过于关注外在表现形式,忽略了社会运动的最显著特征不在于“非制度性”而在于“斗争性”(冯仕政,2013),为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设限,甚至偏离了研究的初衷。

其次,运动中心框架下的理论研究可能陷入对社会运动的刻板印象之中。对动员过程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外部环境的关注,背后的前提假设是认为社会运动的发生遵循绝对普遍的、不受地域特征影响的规律,假设社会运动会以无差别的概率发生在任何地方。在《地域视野》一书中,作者认为“全国范围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概念,甚至民权运动等一些公认的“全国性运动”也无非是一系列地方抗议行动的松散联合。因此,该书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分析探讨运动内部的发生机制,发现决定动员是否成功的、与社区本身相关的情境变量,即在其他因素确定的前提下,相同的诉求主张可能受一系列特定形态的社会动员资源、制度设计与历史先例的影响,从而出现行动结果的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以往对于运动“事件”的过分关注限制了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视野,扭曲了研究者对社会运动和抗议政治的认识,而《地域视野》一书的作者提出应当以“哥白尼视角”(Copernican View)将抗议动员行动放置在政治、经济和地域等多重因素组成的地域网络中加以观察,关注社会运动推动社会变革的本质,使其理论研究真正符合“抗议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主题,其理论贡献在于借助实证分析,超越了以往研究所陷入的认识局限,使社会运动的研究回归应有的轨道。

## 五、比较视野下的冲突治理:《地域视野》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地域视野》一书立足于对美国地方“邻避”运动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冲突治理研究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伴随近若干年来日益活跃的经济交往与政社互动,我国基层社会中涌现出大量矛盾与纠纷的同时,多元利益主体的救济或表达需要也在提升。另一方面,我国“强国家一弱社会的现状”(盛智明,2016)也使许多研究者认为冲突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难以在西方社会抗争理论中找到解释。然而在《地域视野》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冲突治理现状与西方社会运动话语体系的许多交集,在拓展了理论对话空间的同时,也能为我国应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地域视野》的研究首先揭示出社会运动的动员并不是一个超越地域空间的过程,反而总是嵌入到地方社区的情境之下并被地方环境塑造的,这一发现与部分学者对我国社会冲突的观察与归纳不谋而合。例如研究发现,在我国劳资纠纷领域,生产的实践和集体生活阅历影响着劳工一方动员的方式(汪建华、孟泉,2013),其范围和空间分布总是局限于所属地方或工作单位,矛盾的焦点通常也明确指向地方政府与企业管理层(Lee, 2007),导致动员格局呈现出“零星、局地、短暂、片段”(李静君、张永宏,2012)的细胞化(cellularization)特点。另一方面,在当前西方社会运动社会中,冲突和暴力等破坏性特征逐步淡化,常规化与准制度化的倾向日趋明显,而我国被“科层高度吸纳”(李静君、张永宏,2012)的基层抗议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众多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基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维稳”考核压力,近若干年正不断尝试通过规范建设与法制宣传将社会矛盾与纠纷引入制度化、规范化的途径。特别是在媒体发达、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都市,行动者在制度内维权的选择更为多样与低成本;维权群体能够自觉利用制度化方式化

解风险、组织等难题,使集体维权行动得以发展出可持续的支持结构,使他们能够更持续的维护权利和影响法规(管兵,2015)。正如作者指出的,无论是制度内维权还是制度外抗议,其核心都在于“斗争性”而非冲突性;因此融入常规与制度的行动方式非但不意味着社会运动行动空间的失守,反而更应当被看作制度环境的日益开放为动员“策略工具箱”里新增加的行动工具。

长期以来,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对动员结果缺乏应有的关注,很少有研究者会投入很多时间与尽力去研究这种应激集体行动的政治和政策影响。在这一视角下,社会运动的影响充其量体现为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有关亟待解决的社会压力的反馈和警示(Smelser,1962)。《地域视野》的研究脱离了以往的邻避主义叙事,而是将动员过程放在地域空间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同时不再单纯聚焦“反对者”,而是将注意力扩展到范围更广泛的参加者,因为他们的行为也同样构成了社会政策过程中的抗议、稳定和变迁,不仅关注社会冲突的产生,也关注重大决策背后的利益冲突。

对应到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国家转型过程中发展的新职能,创制的新政策和推动的新项目无一不在催生新的社会抗争(黄冬娅,2011),这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可以从《地域视野》中获得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实现维稳思路的改变。在我国当前科层制的分工下,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层面和尺度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决策时,官僚和专家的意见起决定作用,而普通民众以“非专业”的理由被排除在政策议程之外(Beck,1992)。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所选择的“邻避抗争”这种集体行动可能成为他们参与区域治理的主要方式(崔晶,2013)。涉及具体利益诉求的邻避冲突是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常态,基层社会冲突的行动者不仅是公共政策的被动承受者,而更应该被视为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有无冲突,而是能否把这些冲突纳入制度化途径,开通协商性对话通道,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缓解的、恰当的邻避冲突解决机制(何艳玲,2009;何艳玲,2006)。因此,在这一视角下,如何转变以往相对被动的“维稳”思路,将诉求有意识地引入政策过程之中,特别是将更广泛、多元主体的诉求纳入政策议程设置环节,形成以利益均衡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模式(应星,2012)。如果制度化表达渠道对所有利益是平等开放的,那么社会群体采取抗议策略的可能性便会降低,各类抗争行动将被制度吸纳,从利益汇集的角度来看,社会与国家可以通过中介机制建立沟通的渠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不确定性也会随之降低(何艳玲,2005),不仅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政府更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对于促进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社会效果的提升也具有重大意义。

#### 参考文献:

-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87.
- Bullard, Robert. 2000. *Dumping in Dixie: Race,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Boulder, Lolorado: Westview Pres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isinger, Peter.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1-28.
- Gamson, William & David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et al.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Lee, Ching 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McAdam, Doug & Hilary Boudet. 2012. *Putt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Place: Explaining Opposition to Energy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20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et al. .2005. "There Will Be Fighting in the Streets: The Distorting Len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10 (1):1-18.
- McAdam, Doug, Robert Sampson, Simon Weffer & Heather MacIndoe. 2005. "There Will be Fighting in the Streets: The Distorting

Lens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Mobilization* 10 (1).

McAdam, Doug.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5.

McCarthy, John & Clark McPhail, 1998.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in the USA.” in David Meyer and Sidney Tarrow(ed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Boulder,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McCarthy, John, Clark McPhail & David Schweinberger. 1997. “Policing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 Herbert Rieter (eds.). *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eyer, David.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nual Reviews* (30): 125–145.

Meyer, David & Sidney Tarrow, 1998.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ark, Robert & Ernest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1:865.

Smelser, Neil. 1962.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Turner, Ralph & Lewis Killian. 1957.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崔晶, 2013,《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邻避抗争:公民在区域治理中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学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冯仕政, 2013,《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管兵, 2015,《走上法庭还是走向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社会》第6期。

何艳玲, 2009,《“中国式”邻避冲突: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第12期。

何艳玲, 2006,《“邻避冲突”及其解决:基于一次城市集体抗争的分析》,《公共管理研究》第4卷。

何艳玲, 2005,《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黄冬娅, 2011,《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静君、张永宏, 2012,《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开放时代》第7期。

盛智明, 2016,《组织动员、行动策略与机会结构——业主集体行动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第3期。

汪建华、孟泉, 2013,《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开放时代》第1期。

应星, 2012,《超越“维稳的政治学”:分析和缓解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思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第7期。

## From “Mobilization in Movements” to “Mobilization in Places”:

### A Review on *Putt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Places*:

### *Explaining Opposition to Energy Proje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2005*

MA Yuan

**Abstract:** *Putt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Places* gives a critical review on the stereotype of social movement that prevails in current research, arguing that disproportionate attention on the struggles of the 1960s has created a stylized image of social movements that threatens to distort our understanding of popular contention. as public protest is growing peaceful, routine, and local in natur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cal opposition to energy projects in the US reveals that the “local” context, while overlooked by most previous studies, turns out to be critical in explaining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Putting Social Movements in Their Places* sets the stage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and knowledge of cases and is also inspiring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Social Movement; Nimby; Contentious Politics; Social Governance; Policy Participation

(责任编辑:邢朝国)